

## 第一章 欧洲联盟四大国

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中的欧洲代表，也是欧洲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四个大国。在国际贸易中，1994年德国居世界各国第二位，法国居第四位，英国居第五位，意大利居第六位。近年来，它们的国内经济都遇到了不同的困难，急于到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东亚区域市场上寻找出路，因此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有了比较大的增加。

### 一、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其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它的电力工业发达，发展速度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它的钢铁工业技术先进、品种齐全、质量优良，焦比、连铸等技术经济指标居世界前列；它是现代化工业的发源地，无机化学和石油化工的产量和技术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机械工业技术先进，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械设备出口国之一；它是世界第一辆汽车诞生地，当时是仅次于美国的汽车生产大国；它的电子电器工业发展很快，当时亦居世界第二位。德国不但技术先进，劳动力素质高，而且资源状况相对也好。它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联邦德国地区。它的采煤综合机械化程度在96%以上，居世界首位，煤的气化与液化技术亦居世界前列；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1/3以上，超过一般发达国家的比重。因此，1967年以前，联邦德

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制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1948 年任联邦德国经济管理局局长的艾哈德提出要建立“摆脱政府控制和私人垄断的真正的市场经济”，一方面通过法制保障自由竞争，另一方面通过福利政策减缓社会矛盾。

联邦德国 1957 年制订了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反限制竞争法》，禁止卡特尔是其核心内容。它禁止相互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用协议形式来瓜分市场，包括通过协议来确定销售价格、瓜分市场份额和销售地盘；它还禁止处于生产过程前一阶段的企业在销售价格和条件上对后一阶段的企业作约束性限制，迫使其以丧失自定价格和交易条件的权利为代价取得上游产品。1973 年它又补充了兼并控制的内容，规定当一个企业购买另一个企业的全部或相当一部分财产，或一个企业掌握另一个企业的股份达到 25% 以上，或企业之间组成共同核算和共同分享盈亏的康采恩，或一个企业领导层中的 1/2 以上成员兼任另一个企业的领导职务的时候，即被认为是兼并。兼并与卡特尔不同，起初并不限制竞争，相反可能促进竞争，但兼并不会使独立企业越来越少，从而破坏自由竞争的基础。因此，凡兼并后的市场份额达到 20% 以上的企业，凡兼并后的企业中有一个在另一个市场上所占份额达到 20% 的，凡与兼并有关的企业在上个经营年度的职工之和达到 1 万人或者销售之和达到 5 亿马克以上的，都应在兼并之前得到卡特尔局批准。

为了缓解自由竞争激化的社会矛盾，联邦德国 1950 年制定了《联邦供养法》，1951 年制定了《解雇保护法》和《家庭手工业劳动法》，1952 年实行《保护就业母亲法》，1953 年实行《严重残疾人法》，1954 年实行公民子女补贴，1957 年进行养老金改革，建立了一些社会保险基金。其中失业保险基金由雇主和雇员各交 50% 约占雇员收入的 4.8%，可在雇员失业后头两年使他分别获得原工资 68% 和 58% 的失业保险金。工伤事故保险是对全体雇员以及小企业主、农民、家庭手工业者、艺术家、失业者、学生、援外人员的义务保险，由工

商业保险公司、农业合作社保险公司和公立工伤事故保险机构承担。医疗保险基金由雇主和雇员各交 50% 约占雇员收入的 11.9% 独立经营者和大学生的保险费则全部自付。养老保险基金由雇主和雇员各交 50% 约占雇员税前收入的 9.35% 但投保者至少需交纳 60 个月至 180 个月的保险金，才能享受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此外，联邦德国还设立了一些社会救济项目，如失业第三年者不能再享受失业保险金，他可以作为社会无业游民领取使他能过贫困线以下生活的失业救济金。

自由竞争促使联邦德国的投资和工业生产盲目扩大，终于导致了 1966 年 4 月至 1967 年 6 月的全面性经济危机。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幅度达到 7.6%，一些在 50 年代的两次小经济危机中生产仍然上升的新兴工业部门，也第一次出现了大幅度的生产下降。联邦德国 1967 年同 1966 年相比，固定资本投资下降 10.4%，工业生产下降 2.4%，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0.2% 失业人数 1967 年 2 月达到 67.4 万人，比 1966 年 10 月增加 57.3 万人。加上前段时期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导致对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投入不足，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日本相比明显落后，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部门步履艰难，1968 年西方第二经济发达国家的交椅终于被日本夺走。

这种状况促使联邦德国政府于 1967 年 6 月制定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逐步扩大政府运用财政、税收、金融杠杆干预经济的权力，在保持自由市场机制的范围内对经济实行总体调节，以实现适度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和对外经济平衡这四大目标。1968 年联邦德国政府制订了部门和地区结构政策的基本原则，决定编制为期四年的中期财政、经济计划；根据经济状况变动政府支出、私人企业所得税和折旧率；制定产业结构调整的中期计划，包括：大力资助经济上重要但陷于危机之中的煤炭、钢铁、造船、纺织、农业等传统产业部门，促进能源、交通等关键产业部门获得更快发展，积极开发航天、电子计算机、核能等新兴产业部门。80 年代初 联邦德国政府把

产业结构调整同投资、革新、竞争并列为保持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振兴的四大希望，明确提出要推行有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要采取大胆措施挽救处于危机状态的产业部门和及时开发新兴产业部门，技术密集型部门成为发展的重中之重。

1967 年以前，联邦德国实行的是新自由主义财政政策，它主张政府尽量实行稳定少变的财政税收政策，财政预算应尽量保持平衡。1967 年制订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要求财政政策担负反周期任务，在经济衰退时期，尽管税收降低，但政府仍要扩大开支，以刺激需求，不惜承受财政赤字的压力；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则要压缩开支，提高税收，使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平衡。结果，从 1967 年至 1982 年的绝大部分年份，联邦德国政府均有赤字。国债也随之增加，1982 年超过了 6000 亿马克。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虽不可能达到反周期的目标，但却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推动了经济的较快发展。

联邦德国财政部对各产业部门的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和折旧率做了明确规定，逾期不折旧的要交纳高额税金。到 1977 年，联邦德国从国外进口技术专利 3.9 万件，1981 年仅从美国进口的技术专利就达到 6379 件，这些技术专利的 80% 用于电子、机械、化工、钢铁等产业部门，其中电子部门占 41%。在政府的推动下，30% 的企业设立了独立的研究开发项目，企业科研开发人员占全国科研开发人员的 62%，每万名雇员中科研开发人员由 1965 年的 53 人增加到 1977 年的 79 人。1980 年国有企业的科研开发经费由 1965 年的 45 亿马克增加到 95 亿马克，私营企业则由 48 亿马克增加到 102 亿马克。

经过调整，联邦德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1976 年与 1962 年相比，矿业的比重由 5.95% 下降为 2.54%，建筑业的比重由 4.46% 下降为 4.15%；消费品工业的比重由 16.39% 下降为 15.31%，食品工业的比重由 10.93% 下降为 9.54%，公共动力业的比重由 4.18% 上升为 6.99%；工业原材料业的比重由 25.33% 上升

为 26.34% 其中化学工业的比重由 8.13% 上升为 11.22% 设备和车辆飞机制造业的比重由 32.76% 上升为 35.12% 其中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由 5.77% 上升为 6.88% , 电子电气制造业由 7.87% 上升为 0.5% 。与此同时, 联邦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81 年与 1950 年相比 食品与原料的比重由 16.3% 下降为 7.7% , 制成品的比重由 64.8% 上升为 83.2% , 其中最终制成品的比重由 42.6% 上升为 65.8% 。1970 年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 , 1977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机械产品出口国 , 1981 年成为世界尖端技术产品市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国 , 拥有 20.2% 的市场份额。

1982 年德国基督教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后, 为了抑制高财政赤字和高国债促发的高通货膨胀, 决定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为了降低财政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不再让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为了缩小财政赤字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不再让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1986 年 财政赤字由 1981 年的 567 亿马克降低到 200 亿马克,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3.7% 降低到 1% 。

可是 ,1990 年两德统一后, 德国不得不重新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以消化东部地区。1992 年政府预算赤字从 1990 年的 525 亿马克上升到 1350 亿马克 国债达到了 13500 亿马克, 人均负债额超过了美国。德国工业生产 1992 年比 1991 年下降 2% . 1993 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 1992 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表明它的经济已处于衰退之中。德国为了吸引外国资金, 不顾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 1992 年 7 月 16 日将贴现率从 8% 提高到 8.75% 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水平。结果, 不但加速了美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资金外流 而且使美元、英镑、里拉、法郎等货币的汇价一路暴跌。

1990 年 10 月 3 日 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 宪法、议院、政府自动取消 原 14 个专区为适应联邦德国的建制改成 5 个州 变为联邦

德国的第 11 至 15 个州。当年，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下降了 16.6% 其中工业产值下降 28.4%。1991 年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降，幅度高达 31.4%。东部地区不少居民对于统一后可以把手中的东马克换成西马克、可以自由前往西部地区甚为满意，然而当他们从西部地区旅游回来后，却发现原来根本不存在的失业问题已经在迎接他们了。联邦德国吃掉了民主德国后，不但各级政府机关换上了从西部地区调来的官员，而且实行了全面私有化。民主德国的国营工业企业有 8000 多家 到 1991 年 7 月底售出了 3000 多家 托管局得款 116 亿马克，它们可以解决 55 万人就业，然而民主德国原有职工为 980 万人。尽管托管局迫使其中 50 万人提前退休 但仍出现了失业 250 万、半失业 200 万的惊人数字。未失业者的工资比过去有了提高，但物价全面上涨，其中食品上涨 15.4% 房租、电、煤气上涨 58.6%，日用品上涨 55.7% 个人卫生用品上涨 28.1%。这是德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如按东部地区家庭的统计，1991 年的开销平均为 1989 年的 2.5 倍。结果 1991 年 3 月 18 日在东部地区举行西方式选举一周年之际，抗议失业日益严重和社会福利待遇被削减的浪潮席卷了北起麦克伦堡—福尔波门、南至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这同一年前科尔在东部地区举行竞选活动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德国政府仍然企图在 1995 年完成对东部地区的“消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

第一，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西部地区私人资本到东部地区收购原国营企业。可是，私有化过程中的产权混乱以及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提高、银行利率提高、申请贷款的担保要求提高等因素，使西部地区私人资本更愿意在东部地区买地皮建新企业。1991 年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新的衰退，德国西部地区生产能力过剩，但私人资本也没有急于到东部地区投资的欲望。因此，西部地区 1991 年输入东部地区的私人资本只有 220 亿马克，1992 年也只增加到 450 亿马克。到

1993 年，东部地区等待私有化的原国营企业仍有 2000 多家，其中 650 家大型化工、采掘、机电企业无人问津，它们几乎全部亏损。德国托管局原来估计可以通过抛售国营企业，从它们的 6000 亿马克的资产中获利 2500 亿马克，现在它发现，私有化完成后它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负上 2750 亿马克的债务。

第二，由联邦财政和西部各州财政向东部地区提供资助和补贴，除了缓解私有化矛盾外，还可以为吸引私有化投资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服务。科尔政府原来估计 1000 亿马克即可“消化”东部地区，然而 1990 年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转帐资金便达到 1350 亿马克，1991 年增加到 1570 亿马克，1993 年和 1994 年仍分别保持在 1000 亿马克以上。加上德国向独联体提供的 750 亿马克和向东欧国家提供的 120 亿马克援助，为美国打海湾战争支付的 120 亿马克军费，向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提供的 200 多亿马克的秘密援助，加在一起又是 1000 多亿巨额开支。于是德国政府从 1991 年 7 月起增加税收，到 1992 年增税 460 多亿马克。西部地区企业主一片怨声，他们认为通过增加税收来为“消化”东部地区筹资是不公平的，应该用增加负债的办法取而代之，因为负债将来也由东部地区的居民负担。结果，德国国债有增无减，1994 年上升到 2 万亿马克以上。

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一度出现的巨大消费需求使西部地区的经济衰退比其他西方国家推迟了两年发生。可是，“东德效应”也使西部地区的经济衰退爆发得更为强烈，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一些。1993 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为 -2%，固定资产投资比 1992 年减少 6.8%，国际收支逆差为 360 亿马克。为了摆脱困境，科尔政府制订了新亚洲政策。打算从拥有世界近一半人口、25% 贸易额和 27% 总产值的亚洲市场寻找出路。1993 年春天，科尔出访了印度、印尼、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回国后即委托部长们制定新亚洲政策。它提出德国要更多地体现自己在亚洲特别是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存在，与亚洲国家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为此，德国要加强对亚洲的外交工作，增

加互访以加强政治对话；要加强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向中国、越南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增派贸易和商务机构，特别是加强德国对它们的直接投资，政府将为德国企业进入亚洲市场提供出口信贷和投资咨询服务；还要加强德国同亚洲国家其他方面的交流，多向它们提供奖学金和职业培训机会。9月24日德国工业联合会、德国工商议会和东亚协会在科伦成立了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由西门子公司董事长皮勒尔担任主席。他说：“亚太经济委员会不是大工业企业的组织，它的任务是，主动地为德国企业特别是中等企业开辟通往亚洲的道路，把精力集中在传播信息上，促进德国企业界更多地利用亚太地区市场。”德国还在新加坡兴建德国工贸中心，为企业进入亚洲市场服务。1994年初，德国召开了其驻亚太地区各国外交使节会议，要求双边政治关系和多边合作必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保持同步，加强从政府首脑、议会到外交部和政府对口部门的互访与交流。其目的在于改变亚洲在德国的出口中只占10%、进口中只占5%而在德国整个对外投资中只占5%的状况。

德国急于进军亚太市场也是其同美国的矛盾决定的。特别是美国力图使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化，变为美国控制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行动，使德国惶惶不安，深怕被排斥在亚太地区这个因经济高速发展而有巨大的资本货物和基础设施需求的大市场之外。科尔说：“今天亚洲大多数国家由于其有力的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信亚洲在21世纪将有非常好的机会，政治界和经济界应考虑这一点。”过去我们德国人对这个地区不够重视因此我觉得通过我的旅行使我们的公众重新意识到这个地区的巨大潜力和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决心与经济界和科学界一起着手与这个地区的国家建立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科尔要求德国企业界对亚洲发动经济攻势称：“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比迄今更多地存在于这个经济增长地区。尽管我们国内有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继续积极地寻求同正在崛起的新工业国家竞争，并且也要在那里

投资。”德国外交部长金克尔也要求德国政治界为经济界承担开拓亚太市场的重要先锋作用，并且不断发回信号，以改变德国在亚太市场上的出口和投资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尚远远落后的局面。由于亚太地区离德国很远，生活和文化习惯又不相同，因此德国企业主宁愿前往波兰等东欧国家投资。金克尔批评了这种“守家”的思想，要求他们尽快建立“走新的道路和进行新的努力”的信心。他说：“欧洲对东西方对立消失之后的亚洲的认识还很肤浅”，“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经营者们，尚未充分认识到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和时机。德国在亚洲地区投资很少的现象说明了这一点。今后，德国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重视日本、中国和东盟。”

日本同德国的贸易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德国产品要深入开拓日本市场是艰难的，因此中国市场成为德国进军亚太市场的重中之重。

中国与联邦德国早在 1957 年就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联邦德国经济界东方委员会出面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68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了 10 亿马克。1972 年 10 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第二年 7 月签订了双边贸易支付协定。1975 年 10 月 29 日施密特总理访问中国，两国签订了商标协定、民用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并就建立两国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换文。1973 年 7 月后，两国贸易按最惠国待遇对待，开始就联邦德国向中国武汉冷轧厂提供 6.51 亿马克设备的项目举行谈判。在这个大型项目的安装、投产和生产初期，联邦德国派遣了 230 名工程技术专家来中国，并为中国 190 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提供了前往联邦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进修的经费。1975 年 7 月中国在科隆举办了首届中国出口商品大型博览会，9 月联邦德国在北京举办了首届工业技术展览会，参展的有 330 家企业。该年，联邦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由 6.12 亿马克增加到近 13 亿马克，主要出口产品为机械设备、化工产品、高档工业半成品，特别是机器的出口有了超比例的增加。1976 年，双方的经济代表团继续频繁互访，为双边

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10月,中国与联邦德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1979年10月,中国总理访问联邦德国时,双方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这年,中国经济建设的综合平衡被严重破坏,中国一口气向联邦德国进口了采掘、化工、有色金属成套设备27亿马克,中国对联邦德国贸易出现了17亿马克的巨额逆差。1980年8月,中国与联邦德国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下设农业、煤炭、有色金属、投资4个工作组。1983年10月,两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1984年5月,中国驻联邦德国的第一个总领事馆在汉堡开馆;1985年2月,中国在汉堡开设了以联合贸易公司形式出现的“中国欧洲贸易中心”,以加强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和促进技术项目的合作。1985年6月,两国签订了互免双重征税协定。从1980年开始,中国对联邦德国的贸易继续连年逆差:1980年贸易额为35.46亿马克,中国出口14.68亿马克,进口20.78亿马克;1981年贸易额为40.15亿马克,中国出口17.28亿马克,进口22.87亿马克;1982年贸易额为37.67亿马克,中国出口16.99亿马克,进口20.68亿马克;1983年贸易额为47.09亿马克,中国出口19.6亿马克,进口27.49亿马克;1984年贸易额为53.86亿马克,中国出口24.17亿马克,进口29.69亿马克;1985年贸易额为89.85亿马克,中国出口25.56亿马克,进口64.29亿马克;1986年贸易额为88.92亿马克,中国出口27.05亿马克,进口61.87亿马克;1987年贸易额为84.56亿马克,中国出口34.56亿马克,进口50亿马克。为了给中国一些安慰,联邦德国从1984年开始对中国增加技术援助金额,1985年为3400万马克,1986年为4100万马克,1987年超过1亿马克(其中包括为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提供的3000万马克),而1984年以前一共只有7650万马克。援助的重点是农林业、采掘业、专利事业、经济和法律咨询业以及上海经营管理培训中心、联邦德国工业标准在中国的应用和新华社。从1985年开始,联邦德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1985年为5000万马克,1986年

为 7000 万马克,1987 年为 1 亿马克。中国与联邦德国在原材料、采选矿、冶金、和平利用核能、民间宇航、海洋等科技领域开展了合作,两国的研究机构也签订了有关运煤管道、采矿技术、石油勘探、核反应堆安全与辐射防护、再生能源、航空航天、电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技术合作协定。除了联邦德国科技部外,它的经济部、粮食部、农林部、青妇家庭卫生部、交通部、环境自然保护与反应堆安全部、内政部、教育科学部也同中国开展了科技合作。

德国的新亚洲政策出台后,德国把中国作为实施这一政策的重中之重。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主席皮勒尔强调说:“当前德国新的市场重点在东南亚,而该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市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德国执政联盟议会党团的提案和声明肯定了这种看法,说:“亚洲经济增长的重点是香港、台湾和南部中国这三个角。”这个三角构成了一个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未来全中国经济区的轮廓,这个经济区的潜力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由于这个地区的活力正对其他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中国这个国家的伟大和存在,由于它的活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作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分量,执政联盟支持进一步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1993 年 3 月德国经济部长雷克斯罗特访问中国,带来了 500 亿美元之巨的可能订货单,与中国签订了 9 项经济合作项目协议和意向书。这对不顾中国警告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的法国,无异于是一个打击。5 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德国,除了同金克尔举行会谈外,还受到了科尔和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接见。德国领导人积极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强调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展对中国关系的重要性,重申德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拒绝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11 月科尔自 1982 年出任总理以来第三次访问中国。他在同中国总理李鹏的会谈中重申:“德国坚持阿登纳总理以来所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表示,德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伙

伴，他这次访问中国的目的是要加强德国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赋予德中关系以新的质量。他除了邀请李鹏访问德国外，还分别代表魏茨泽克和德国联邦议院主席团邀请江泽民和乔石访问德国。科尔这次访问中国带来了由 180 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带回了总金额为 28 亿美元的 20 个经贸合同，还获得了上海同济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1994 年，中德贸易出现了新的发展。据《欧洲统计》提供的数字 双边贸易由 1992 年的 83 亿欧洲货币单位猛增至 130 亿欧洲货币单位 增长幅度达 57%。该年 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为 53 亿欧洲货币单位，法国为 45 亿欧洲货币单位，意大利为 45 亿欧洲货币单位，德国对中国贸易额接近于这 3 个欧盟主要国家之和。1993 年以前，德国对中国的投资发展不快，1981 年至 1991 年 10 年间累计项目只有 128 个 协议金额 11.7 亿美元；1992 年虽然增加到 130 个 但协议金额只有 1.3 亿美元。1993 年项目数量猛增至 320 项 协议金额 2.5 亿美元；1994 年项目数量减少了 6 项 但协议金额猛增至 12.3 亿美元。这表明 德国像戴姆勒—奔驰集团这样的跨国公司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作为德国四大产业之一的化学工业 1994 年国外营业额为 871 亿马克 比 1993 年增长 13% 其中在中国等亚太国家增长最快，从而不但推动了整个德国化学工业摆脱 1992 年以来的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困难，而且使它在国际竞争中仍保持了优势。

不过，中国与德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要取得进一步发展，也存在着各种牵制因素。一是德国对中国的贸易连年顺差，顺差额呈扩大趋势。按中国对外贸易统计数据，1994 年双边贸易额为 119 亿美元 中国向德国出口了 49 亿美元 进口了 70 亿美元 中方逆差 21 亿美元。中国愿意扩大进口德国的技术和设备，提高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在 1994 年只占中国全部进口 6.2% 的比重，但是德国如不同时扩大从中国的进口，中国要进一步扩大从德国的进口将会力不从心。二是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步子仍然太小。到 1994 年年底中国一共引进

外资 22 万个项目 德资仅占 892 个 不足 0.5%。而英国却有 1000 多个项目，协议投资额 57 亿美元。德国来华投资企业尽管在资金实际到位状态方面情况较好，但它们在同中国的谈判中，往往提出诸如享受市场试验权、销售代理权、从事国内贸易权、在第三产业进行配套投资权等特殊要求，而使谈判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经过中国方面的交涉，不愿缩小自己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的德国政府在 1994 年年底和 1995 年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1994 年 10 月，德国经济部和海外商会将其在香港的工商代表处延伸到中国上海，在十六浦建立了德国驻上海工商代表处。它既为德国企业的产品和资金进入中国提供服务，也为德国在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帮助。它的工作范围包括：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提供有关供销渠道和销售策略方面的咨询，为建立合资企业和申请许可证提供帮助，撰写中国市场调研报告，协助进行资金结算，了解企业资信状况和排解纠纷，开办各种培训班，向新闻界提供经贸信息等。德国还打算进一步在北京、成都等城市设立这样的代表处，并在中国其他省市设立联系人。4 月初 德国拥有 1200 万人口的大州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勃率团访问中国，成员包括 20 多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对自己到达中国的当天就得到了中国总理李鹏的接见和宴请深为感动 表示国民生产总值的 1/3 靠出口来保证的德国不能不努力在中国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4 月 5 日下午他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因交通堵塞他迟到 20 多分钟。他以此为话题，强调了基础设施市场对德国以及巴伐利亚州的重要意义。他算了一笔帐：如果中国经济今后每年保持 9% 的增长速度，那么单是从对能源的需求这个角度看 每年就需要增加 180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而巴伐利亚州在火力电站和核电站的技术与管理方面拥有竞争优势。

1995 年 7 月，江泽民访问了德国，德国的各大公司同中国签订了有关汽车和能源等方面的 9 个合同 总价值额为 45.25 亿马克 折合 32.32 亿美元。11 月，科尔第四次访问中国，随同前来的有教育、

研究和技术部长吕特格斯，邮电部长伯奇和经济部长雷克斯罗特以及西门子公司、戴勒姆—奔驰集团、克虏伯集团、汉莎航空公司、贝特尔斯曼集团、安联保险公司等 45 家大企业的老板或总经理。为了装下这个由 200 余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德国政府为这次访华提供了两架大型客机。作为科尔访问中国的见面礼，11 月 9 日戴姆勒—奔驰集团驻中国总代表处在北京开业，成为该集团在世界上的第 12 个总代表处；11 月 10 日，欧洲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德国安联保险公司总裁表示，它作为再保险人参加了中国诸如二淮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工程、燕莎中心、上海大众汽车等项目后，还打算寻求一家中国公司合资开办人寿保险业务，并于 1996 初在亚洲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直接在中国投资。11 月中旬，奥迪股份公司正式宣布加入一汽—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它持股 10%，大众汽车公司持股 30%，一汽持股 60%。根据合资条款，奥迪股份公司将从 1996 年下半年开始在一汽—大众新厂生产改良型的 AUDI—100 型汽车。初生产能力为 3 万辆汽车和 5 万台 V6 型发动机，到 2000 年达到 6 万辆汽车和 10 万台 V65 气门发动机的生产量。为此，整个合资企业预算投资 6.5 亿马克。一汽从 1988 年开始组装奥迪 100 型轿车以来，国产化率已达到 64%，奥迪股份公司已供销了 9 万辆汽车。这次的合资协议规定，奥迪股份公司原来与一汽的合作暂时不受新合资协议的影响。德国拜耳集团计划在中国投资 3 亿马克，用来建立六至七个工厂，其中包括胶片厂和工程塑料厂。已在中国建立了五家工厂的巴斯夫公司亦计划到 2000 年将它们的营业额翻一番，达到 10 亿马克。

科尔 11 月 12 日到达北京后，第二天江泽民就接见了。科尔表示：德中两国关系很好，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任何问题，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够进一步加深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江泽民说：中国有关部门很好地研究了科尔总理提出的关于成立两国高科技委员会以及加强在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的建议，对此表示欢迎。科尔在同李鹏的会谈中承诺德国在台湾问题上将继续

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李鹏对此表示赞赏，并说：中德两国除了贸易额达到了 119 亿美元的创纪录数字外，在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深入发展，友好省、州、市之间的交往十分活跃并富有成果，两国军队的关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13 日上午 中德经贸混合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九次会议，李鹏和科尔出席并讲了话。同日上午，中德两国代表签署了关于成立中德高技术对话论坛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延长和扩大中德基础设施小组工作的联合声明，关于中国对外经贸部和德国经济部开展对外经贸法律合作的联合声明，关于建立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的协定。中德两国公司随后还签订了总额为 21.9 亿美元的 12 项合同和意向书，包括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与德国戴姆勒—奔驰集团公司建立和平利用空间项目的全面合作备忘录、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与德国布莱梅伏尔坎造船集团全面合作造船的意向书等。这表明，中德经贸关系在 1996 年将会有一个新发展。1995 年 中德贸易额达到 130 多亿美元 约占整个欧洲联盟与中国贸易总额的 1/3。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德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障碍都已消除了。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中国工作组组长、德中经济合作与投资委员会德方主席魏斯 1995 年 11 月初对德国《商报》称：1994 年上半年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变为逆差，德国向中国出口了 46.1 亿马克 却进口了 73 亿马克。但他承认：德国工业界对中国的投资依然疲软，1995 年上半年直接投资额不过 2.7 亿马克，仍然远远落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1994 年德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为 2.6 亿美元 美国投资是德国的 10 倍 日本投资是德国的 8 倍。这种差距 1995 年能否缩小，依然不得而知。他认为阻碍德国对中国投资的障碍在于：(1) 两德统一后，西部地区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东部地区；(2) 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的优惠条件，但费用不高、距离不远，没有心理状态上的巨大差异；(3) 德国许多资本货物公司在 1992 年至 1994 年的经济衰退时期中亏损，因此缺少资金对中国投资；(4) 中

国推行的控制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虽然卓有成效，但使许多中国企业因此缺少资金同德国建立合资企业。他认为中国并不缺乏资金 尽管中国的外债达到 1050 亿美元 但外汇储备 1995 年 10 月亦已达到 650 亿美元。(5)中国地方当局在对合资企业的水电供应和征收地方捐税方面各行其是，“只要发现来了有钱的外国公司，往往就狠狠敲竹杠”。他对中国政府调整税收结构、实现国内税收平等的意图表示理解，但对各省在征税方面各行其是表示不满。(6)由于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而使劳动力成本增加，德国经济界感到不满。但他又说：许多德国投资企业要求，向从事同样工作的中国职员支付与外国职员一样的工资。(7)德国在微电子和基因工程领域处于落后状态。但他认为：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交通、能源、电讯、钢铁工业中，德国人始终是强大和具有竞争力的。他还反对中国政府关于取消三资企业在关税和国内税方面的优惠待遇的计划，警告中国政府不要拿投资环境的优势去冒险，因为“亚洲各国为争夺外国投资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中国现在有失去领先地位的危险”。

魏斯的这些说法有的反映了德国厂商唯利是图的本性，有的则是中国有关部门在吸引德国投资中值得总结的问题。

由于德国政府不愿像日本政府那样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软贷款”至多只愿意考虑提供赫尔梅斯信贷担保 或者视项目情况动用发展援助基金，因此德中统一交通项目指导委员会与德国投资开发协会磋商，是否能按建造——经营——转让的 BOT 投资模式成立经营公司，争取复兴信贷银行的参与，共同对中国的交通项目投资德中统一交通项目指导委员会 1995 年确定了四个项目，包括一条从华北到长江三角洲的通道、黄山旅游区基础设施的开发、运煤铁路线的扩建、上海浦东新区机场的建设。由于日本政府愿意为这个机场项目提供贷款，德国政府不愿意，因此德国参与这个项目的投资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为了争取到除了上述四个项目外的投资项目，德中统一交通项目指导委员会决定为黄河轮渡和若干公路项目提供

BOT 投资模式。该委员会负责人泰尔奇克援引德国驻华大使赛康德的话说：德国的命运将在今后四五年内的中国市场上决定。泰尔奇克说：“这个市场刚开始开放。是的，德国人来得稍晚了一点，没有赶上开始时的兴旺。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以便保住我们五年后的机会。”

德国金融业也纷纷抢滩中国。德国商业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已获准在上海开业，后者 1995 年 10 月 19 日和 20 日分别在深圳开设了分行和在广州开设了办事处。西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巴伐利亚抵押和汇兑银行、汉堡联合银行、德意志合作银行、巴伐利亚州立银行也在上海开设了代表处。其中德累斯顿银行曾为汉莎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合资的北京维修中心融资 6000 万美元。巴伐利亚州立银行是北京明华物业发展公司 1.2 亿美元贷款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和对外存款充足，其中外汇储备 1995 年 11 月达到 730 亿美元，而且月月在上；1994 年底，中国银行和其他银行在西方金融机构的存款达 600 亿美元，而需要偿还的贷款只有 57.4 亿美元，其中它们在巴伐利亚州立银行中的存款超过 30 亿马克，几乎同德国银行对华贷款额相等。德国银行 1994 年在中国的贷款虽然增长了 60%，但商业贷款额只达到 28.4 亿美元。

## 二、法国的经济实力及其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法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面积为 55.15 万平方公里，居欧洲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它的人口约 5700 多万，少于德国。法国人口密度不高，每平方公里不过 100 多人，不足德国的 1/2，但是分布不均衡，塞纳河口至罗讷河口以东地区的面积仅为全国的 45%，人口却占了近 70%，其中巴黎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700 多人，以西的法国中部地区人口密度则在每平方公里 50 人以下。与之相应，法国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塞纳